

人文
学术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

朱立元 著

Literary Theory in New Period:
Towards Modernity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执行主编 李 钧

朱立元 著

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

Literary Theory in New Period:
Towards Modernity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朱立元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1405-8

I. 走… II. 朱… III. 文艺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487 号

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

朱立元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366 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405-8/I·918

定价: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着手组织“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想起了十多年前由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那套大型丛书先后出版了三十余位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检阅。“丛书”从2000年第一辑(六本)出版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又有了巨大的进展,文艺理论的建设也继续经历了激荡起伏的进程。现在再编辑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可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考虑到出版周期的原因,“文库”计划先期出版十二本。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有成就、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远超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优先考虑“三〇后”“四〇后”学者加盟这套“文库”,但即便如此,目前只能有十二位学者入选,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再能陆续出版。

入选“文库”的这十二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理论文集,记录着每一位作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感受到的深切体验,所获得的宝贵感悟,所留下的坚实脚印,以及靠着艰辛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虽然无法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成果,但至少也可以折射出它的部分光影,勾勒出它的大致轨迹,对今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或有些许参照价值,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缘由。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令后来者怀想的年代。启蒙的激浪,保守的潮汐,新生的欢欣,怀旧的惆怅,都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心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正名”“回归文学自身”的呼吁,冲破了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工具的禁锢,重新发现和

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学界学习马克思《巴黎手稿》引发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全国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先后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步框架,为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贯穿上述种种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则是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虽然当时及以后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但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一代学人的亲身经历,它实际上塑造了文艺理论家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较之于他们的具体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

经过新时期前十年的理论积淀后,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被积极引介到中国,一种迫切想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现代性冲动也成为国内文艺理论家们挥之不去的情结。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同时以哲学和文论的名义登陆国内理论界,就是一个富于意味的信号。由此带来的研究格局也显得流派纷呈,思潮更迭,这是转型期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必然表征。90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主阵地尽管不在文学理论领域,但最初发动是在文学界。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勃兴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巨大冲击,造成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危机,引发了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反思,由此才催生出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话题。经过这场大讨论,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在多个向度上向纵深发展: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审美意识形态论”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成为文学理论建构中深层次的思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吸纳始终在争议中前行;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今;90年代末,文艺理论界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的流变历史和经验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历史的反思,寻找继续前进的正确路径……整个90年代,中国文艺学在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诸种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哲学解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方法不断涌入,并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进而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展开,有些研究方法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修辞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的建设,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时代终于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现代性焦虑在趋深,中国文学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转移着学界的注意力,成为新一轮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与此相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下,围绕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掀起新的波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家的自觉追求;对西方文论借鉴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冷静和辩证,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90年代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转向了务实的尝试和实践,在古代文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可喜的实绩;文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建构和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文学作品生成和传播的格局,向传统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成为当代文艺学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比起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显得更加沉稳,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于这三个时期的始终。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标准,从美学的和史学的,到人民的、美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和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种把当代文艺理论要么看得危机重重、漆黑一团,要么说成完全是始终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搞全盘西化那一套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所编辑的这套“文库”中的十二本论文集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还远远不够

充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在其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总序中曾经预言,“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收入丛书的众多论文集,“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21世纪的前十五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编辑的“文库”,同样希望能够作为当代文艺学的一部分思想资料,“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照、启示和借鉴。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能够在我国人文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今天推出,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里,我们必须专门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孙晶博士。是她首先主动向我们提出建议,出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她的远见、魄力和眼光令人敬佩。在此,我们代表“文库”的十二位作者,向孙晶总编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们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不能不为“文库”的作者之一、我们敬爱的童庆炳先生的猝然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以他今年4月亲自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的出版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朱立元 曾繁仁

2015年国庆节

前 言

我是“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人文学科学人。1978年考入复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81年留校工作,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热爱和从事的专业,大体上分文艺学和美学两个领域,虽然两个领域在学术上多有交叉、重叠,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有不同侧重点的。三十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这两个理论领域的原野上忙忙碌碌地耕耘着、劳作着,别人看来也许十分辛苦,但是在我则乐在其中。本论文集收录的是我在文艺学领域耕耘的部分成果。

我的文艺理论研究,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和贴近现实。文艺理论界每个时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和讨论的热点,我几乎都积极参与进去,至少会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倾向。我也许可以引以为荣地说:我是从新时期到新世纪30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曲折发展前行的全程关注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比如,20世纪80—90年代文艺理论界讨论和争鸣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典型和性格组合问题、方法论问题、现实主义和艺术真实问题、文学主体性和艺术反映论问题、市场经济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问题、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等等,我都积极参与,发表自己的看法。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论文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者争论、商讨的,可能会以为我喜欢争论。其实不尽然。我之积极参与讨论,并不想学术上一争高低,或者用当下的流行说法热衷于争所谓“话语权”,而是想弄清问题、走近真理。我并不认为自己都是正确的,更不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我的恩师蒋孔阳教授常常教导我们,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这真是金玉良言,我始终牢记在心。所以,我参与学术讨论,乃是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争鸣或者讨论,有助于对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每一个参与讨论的学者修正和完善各自的见解,使之更加接近真理。事实上,我从这许多讨论中深受启发,获益匪浅。所以,我愿意把这种讨论或争鸣称之为“对话”。对话就意味着平等的交流、商讨,而不是其中一方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以势压人,甚至乱扣政治帽子。

真正的学术对话,我是乐意并积极地参与的。进入新世纪后,我仍然不改初衷,继续参与了如何理解和继承中国文论的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尺度、对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总结与反思、对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与现实、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等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笔者从这类“对话”文章中选取了自认为较为重要的收入本论文集。

由于许多文章在写作的时候都对相关问题带有一定的反思性和探索性。我理解的探索,就是要探讨一些新问题、提出一些新观点、尝试一些新方法,一句话,要有一些创新。笔者不敢说本论文集有多少创新之处,不过自觉有几篇论文在创新方面有一些亮点:一是在1990年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亦即中国化的命题,并作了一些至今看来尚未完全过时的阐发,这在国内学界应该属于比较早、比较新的;二是比较早从现代存在论角度思考和阐释了文学本体论问题,对某些有本质主义意味的“文学本质论”思路有所突破和创新;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近年文艺理论界研究相对薄弱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进行了再阐释,产生了一定影响。以上概括不一定妥当,也似乎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实际上笔者只是想坦诚地把这些年个人所做研究中自以为值得一提的心得说出来,向学界同仁求教,以求得批评指正。

在编这本论文集时,自然而然回顾起自己学术耕耘和成长之路的艰辛。想当年刚刚踏进文艺理论界时,才三十多岁,而今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不免有些唏嘘和伤感。当然,笔者并不悲观,一方面清醒地自知学术上根底不深,并无更大的雄心;另一方面却也不甘落后,愿意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虚心学习和研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努力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提供些微正能量,做一点微薄的贡献。这是我的心里话。

朱立元

2015年1月22日

目 录

前言	001
----	-----

辑一 现实主义与艺术真实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002
论典型的复杂性与审美价值	
——兼评刘再复的“二重组合原理”	013
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	032
对艺术真实的心理学探讨	043
论艺术真实的动态模型	058
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考察	084
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反思	097

辑二 走自己的路

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	112
精英文化的衰退与文化精英的困顿	126
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	135

命名的“情结”

- “新状态文学”论刍议 145

- 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 156

- 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165

走自己的路

- 对于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建设问题的思考 195

辑三 新世纪文艺理论再探索

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

-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218

- 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预设 237

呼唤崇高

- 新世纪文艺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 254

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 关于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研究突破之途的思考 263

- 试析“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结构 275

- 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 284

-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文艺学的创新建构 301

- 关于文学本体论之我见 305

- 新时期文论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313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

- 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 324

-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当代文艺学建设 336

对“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再认识

- 对刘为钦先生观点的若干补充和商榷 346

辑一 现实主义与艺术真实

◎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 论典型的复杂性与审美价值

——兼评刘再复的“二重组合原理”

◎ 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

◎ 对艺术真实的心理学探讨

◎ 论艺术真实的动态模型

◎ 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考察

◎ 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反思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提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论点,出色地体现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的重要原理之一。正确地理解和自觉地运用这一观点,对于深入研究中外文学史和各种文艺思潮的发展兴衰,对于从总体上把握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建立我国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对于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的持续繁荣,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在50年代末曾展开过关于“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讨论,可惜未能深入下去。近年来,各地刊物发表了不少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出现了不同的见解,讨论又重新展开。较多同志认为“不平衡关系”是艺术发展的“客观的”“普遍规律”。张怀瑾同志在50年代末和近年来曾就此问题写过多篇论文,力主“不平衡规律”说。最近他又发表了《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一文^①,比较全面、集中地论述了“不平衡规律”说。我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

马克思是在《导言》第4部分第6点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一著名论点的。要正确理解这一观点,关键在于弄清什么是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的实质,两种生产是在什么意义上、就哪一方面进行比较的。对此学术界目前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马

^① 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4期。本文所引张怀瑾同志的话均出自此文。

克思说的“物质生产”仅仅指社会生产力,因此“不平衡”是指艺术生产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速度的不一致,张怀瑾等同志就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认为“物质生产”主要指生产关系,平衡不平衡是指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关系是否相适应的问题;第三种认为“物质生产”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加以把握,即应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因而“不平衡”亦应是艺术生产发展的兴衰,同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的综合比较所得出的判断。我认为第三种看法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首先,在《导言》第4部分“不该忘记”的八个要点(包括“不平衡关系”的论点)前面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标题:“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联系。法的联系。家庭关系”。这就给后面的八点规定了论述的范围、方向 and 核心。有重点号这一句更明确地说的是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即精神生产部门)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一标题下的第6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其范围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之间的比较;所谓“不平衡”,也应是艺术生产(上层建筑)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某种不一致、不适应。如果对八个要点的理解与运用摆脱或超出了马克思自己的规定,就容易产生误解或曲解。

其次,马克思对这种不平衡关系作过具体的阐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①很明显,马克思是把艺术生产同社会及其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进行比较的。前一句中的“社会”,主要不是指生产力,而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说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此一句中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当然应当包含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内容,但所谓“社会组织”无疑指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有机体,因而它的“骨骼”或“基础”,当然应当是一定的生产力同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像张怀瑾同志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单纯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力。可见,马克思这儿讲的两个“不成比例”(即不平衡)是对艺术生产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作的比较。

张怀瑾同志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艺术生产只能同生产力相比较,同生产关系则不可比较。他说:“生产力有一个发展水平问题,它和艺术生产有可能形成不平衡的发展……生产关系却不是一个发展水平问题。艺术的领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只是一个是否相适应的问题,而其含义及其基本内容决不能够和生产力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这个看法大可商榷。

第一,把生产力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单独同艺术发展进行比较,既不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也取消了两种生产发展的历史性质。人所共知,生产力、生产关系、艺术生产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物,都是历史的范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或艺术生产。生产力的历史性质恰恰是在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显示出来的。从社会发展史看,各个社会形态的递进(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联系虽难以用数量来判断,但还是可以找到与一定生产关系大体相应的物质标志,如石器时代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相联系,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相适应,铁器的广泛使用标志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蒸汽机的发明则更迎来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说,一方面,生产发展水平(人对自然的征服关系)决定着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和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生产力又始终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如果把生产力的进步从一定的生产关系发展中孤立、游离出来,那么生产力本身的历史性质也就丧失了。所以马克思在提出“不平衡关系”的前一点,强调了“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而在提出“不平衡关系”后又紧接着提醒我们,“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理解”^①。如果我们拿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抽象、一般的生产力进步同艺术生产的具体、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那倒真是既无法比,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例如,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无疑比古希腊高出千百倍,但现代人创作不出可与荷马相比拟的伟大史诗,这似乎是不平衡了;但同样,荷马时代能出现黑格尔说的现代的史诗——长篇小说吗?能出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这样的巨匠吗?就这点看似乎又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衡了。可见,这样比较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同理,如果撇开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变化,单比较艺术发展与生产力水平也无法理解生产力大发展的西汉,为什么诗歌衰落而辞赋却大为兴盛。

第二,生产力虽然对艺术生产有某种直接的制约作用(如造纸、印刷术的发明,交通工具的发达等等),但一般说来,并不同艺术生产发生直接关系。生产力总是通过生产关系才对艺术生产发生影响,艺术生产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斯大林说:“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发生的。”^①我们考察两种生产的关系,也不能越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只有把生产力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同艺术生产进行综合比较,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三,生产关系与艺术生产同样有可比性。比起活跃的生产力来,生产关系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无疑也包含着发展水平问题。惟其如此,它与艺术生产的发展才可比较。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作出定量分析,生产关系则可以进行质的判断。人类社会五种发展形态就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进步;在同一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视它们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有进步、落后、反动之分,每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本身也还有个逐步完善、健全的过程。至于艺术作为精神生产部门,其发展水平很难进行定量分析,但能判断某一样式或整体上的相对繁荣或衰落、进步或落后。在这一点上,倒是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很类似,因此具有可比性。

总之,两种生产的比较应是质的比较,具体历史的比较,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具体统一体的比较。这种比较,实质上就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否适应的问题,就是一定的艺术生产是否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平衡”与否同“适应”与否属于同一性质同一范畴的问题,我们不应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

二

《导言》发表若干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两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更为明确、全面的论述。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①这段话是针对施托尔希的两种生产“绝对平衡”论而发的。施托尔希认为,精神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力手段,物质财富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力手段”,“国民福利因这两种生产的平衡而不断增长”。他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生产混为一谈,不分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抹杀了矛盾双方的主次差别,又把物质生产仅仅当作财富生产(即生产力)而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割裂开来,只能成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因为他“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之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②。这种抽象的超历史的平列对比,必然“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③

马克思的这一系列论述提供了正确理解两种生产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方法论,给了我们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在这里,马克思重申了物质生产一般地支配和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一般地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两种生产的基本平衡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包括“一定的社会结构”(即生产关系)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即生产力水平),“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